

李
松
山
著

于保合回忆录

李 龙整理

一九八二年十月

居乃松山客
 後分家入高
 情事可耐言
 前

詠事此託
 陳雷同志

陳雷

陈 雷 同 志 赠 诗

(一九八二年五月掇)

咏抗联战友保合、在德同志：

君 乃 松 山 客，

素 知 凌 风 雪，

风 雪 总 无 情，

幸 有 耐 寒 节。

陈 雷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



于 保 合 同 志

(一 九 六 四 年 摄)

目 录

一、照 片

陈雷同志赠诗

于保合同志

二、目 录

三、回忆录

1~142

故乡 (1) 启蒙 (4) 觅路 (6) 考验 (9) 入共青团 (12)
接受任务 (15) 去莫斯科 (19) 学无线电 (21) 回国途
中 (24) 到上海接关系 (27) 回哈尔滨找组织 (30) 新
的岗位 (33) 在游击区里 (36) 艰苦的斗争 (39) 王、
康指示信 (43) 转为共产党员 (46) 抗联三军 (49) 电
信学校 (52) 政军学校 (55) 出击 (58) 王连长牺牲 (61)
在岱巴气休整 (63) 北满省委扩大会议 (66) 六军
被服厂 (75) 到三军四师, 陆希田师长的牺牲 (80) 生死
之间 (81) 到宝清三十二团 (83) 我要见赵司令 (85)
归国第一仗 (86) 支委会决议 (89) 消灭日本测量队 (92)
忠贞团结 (95) 慰问陈绍宾部队 (97) 电台工作
(100) 一九四〇年在苏联 (102) 在宝马顶子 (106)

恢复我的党籍 (108) 到八十八旅 (111) 两年军训 (113)
回国 (116) 在长春见闻 (119) 回到八路军 (124) 进
出长春 (127) 电台工作情况 (131) 随军南下 (133)
抗美援朝 (137) 往事的回顾 (139)

四、附 图

1935~1936年在中共珠河中心县委活动示意图 (26、27)
1936~1937年依汤地区示意图 (66)
1937年7月北满省委扩大会议会址示意图 (66)
1937年3~5月三军留守一团一连三次攻打金矿进军路线图
及1939年7~12月东北抗联总司令部活动路线 (89)
1938年以后活动在三江平原上 (106)

五、附 表

1935年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名单。1936年中共北满临时省
委名单。1937年秋中共北满省委常委名单 (39) 东北人民
革命军第三军一九三五年编制表 (50)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
一九三六年编制表 (50) 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一九三七年编制
表 (58) 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四师一九三八年编制表 (78)
东北抗联总司令部组织系统情况 (89) 中共旅党委——旅长制
情况 (113) 苏联红军远东军区独立特别八十八旅一九四三年
至一九四四年情况 (113) 附：后勤部、无线电营

六、年 表

1~17页

七、后 记

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四日我出生在吉林省伊通县南青咀子。这是个山青水秀的好地方，它位于长白山的边缘，哈达岭的西北麓。清澈透底的伊通河水，哗哗地不断从村里流过，又缓缓地向北流去，经过长春市，继续向北注入第二松花江。

青咀子是我祖居的地方，我们家是满族镶黄旗人，历代务农。清末我爷爷于浪，满族名字叫札隆阿（1844~1911年）靠水洼地三垅自耕为生，有毛驴一头，草房三间。爷爷生活异常俭朴，听爸爸说，一个咸鹅蛋要吃半个月。可是他不甘于贫困地位，十分好学，一边种地谋生，一边读书学习，后来去京投考，考中秀才，这在小小的山村里成了了不起的大事儿。可是，在清朝的官场上则远不够级的，仍然是靠这三垅涝洼地种些稗子和谷子这些耐涝的庄稼过活。由于连年灾荒，在我还没有降临到人世间的时候，爷爷就病逝了。在我三岁那一年，全家搬到离青咀子只有三里的南关屯姥姥家附近。

南关屯距县城十八里，西南可遥望青咀子。姥姥家姓关，比较富裕，有五间青砖瓦房，后来因借高利贷而逐渐破产，生活一年不如一年。我家住在姥家西边，有草房三间，正房朝南，还有东厢房和西仓房。门前有一条东西向大道，在我们家门口隔路有一口水井。

南关屯是我渡过童年的地方，给我留下了亲切的记忆，我十分热爱自己的故乡。这个屯子只有十几户人家，是个挺小的村子，我和小伙伴们经常在村边玩耍，还到南山放猪、放羊。记得在村子西头有棵百年老榆树，相传是棵神树，当时人们迷信，在天旱时就都到“神树”下焚香

跪拜，求上天降雨。我父亲不信佛，也不迷信，母亲信佛，她常说：“不管有没有神仙，不可强信，也不可不信。”对孩子们也不强求信佛。

父亲于崇礼（1891～1952年）在爷爷的坚持下，省吃俭用供他读书，从简易师范毕业以后，在县里的税捐局当收发，后来在二旗小学当文牍，脱离了务农谋生。为人吝啬，认为只有土地才是根本，所以逐年积累薪金买土地，几年的积累在孤家子买了二十来垧地（东北每垧地为十亩）靠吃地租，家境有了好转，还供给我叔父于克己（1901～？）读书。可是为了给亲友担保代借高利贷，1930年把地照典押给福兴当和德玉长，因无钱赎回而破产，流离失所，以后以教私塾度日。解放后当过职员、仓库管理员和烟厂工人，后来又来到延边果树实验场当农业工人。

叔父于克己是父亲的胞弟，父亲供他读书，从吉长道立中学毕业后，留学日本。曾任吉林省留日学生经理员，张作霖元帅府秘书处秘书。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先在吉林毓文中学当图画教员，后来为日伪服务，当上吉林交涉署科长，伪外交部北满特派员公署调查处长，哈尔滨日本关东军第三师团司令部宣抚官等职，于一九三五年三月我到反日游击区工作以后，再也不知其下落。

家中的成员还有一个老祖母刘氏（1861～1934），母亲关氏（1882～1938），三个姐分别比我大八岁、五岁和两岁。一个堂弟于保民比我小五岁，胞弟于保太比我小十岁，现在吉林省辉南县木材公司传达室工作。

也许是祖传的观念，认为只有读书才有出息，在我才六岁的时候，母亲就送我到私塾读书，去了两天看老师打学生我十分害怕，说啥也不去了，在家自学国文第一册，由于我聪明好学，很快就学完了。第二年

母亲又送我到私塾读书，这次坚持了半年。因为学习用功，很少挨打。年底父亲回家来时，我决心随父亲到伊通县城去上学校读书，母亲怕我年纪小不放心，可是我和爸爸终于把她说服了，第二年春天，也就是一九二二年春入伊通县私立二旗小学插班二年级读书了。

在二旗小学我认识了关山复，他比我晚半年，原来两个班在一个教室，后来分开了。在这个学校还认识了付景廉和金景，毕业后我们一起投考了县立中学。

在二旗小学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有一次高年级学生受“五四”运动的影响，不满意学校维护旧礼教，反对白话文的推广，国文教员全是教文言文的“老古董”，他们举行了罢课，但是没有明确的主张和要求，罢课后走出城郊数天又回来复课了，这次自发的学潮可对我们低年级小同学影响很大。“五卅”惨案后，有关惨案的小册子和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国耻事件，激发了学生们对帝国主义的仇恨，对卖国军阀的仇恨。直奉军阀混战时，群众有不同议论，但不要内战，要国家富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则是群情一致的。这时接触了许多新事物，如有的学生问老师：“赤党白党之争是怎么回事？”教员不让过问，只简单地解释说：“赤党是穷党，白党是富党，这是俄国的事，赤党胜了，白党败了。”这个故事的真相直到我中学时代才明白，这是十月革命无产阶级胜利了，夺取了政权，建立起了劳动人民当家做主人的苏维埃政权。

在我的童年时代，印象最深的是“丘八老总”，这些军阀的军队最恨人。我的家靠近公路，奉系军阀的军队经常到我们家驻军。每当寒暑假回家的时候，经常遇到“老总”们的威吓我母亲，翻箱倒柜找大米、白面、鸡蛋，翻不出时就让我母亲去借，要不然就打。有一次我母亲去外祖父家借了大米回家，看见他们正在打小鸡，十个小鸡打死了一半，

还让我母亲给他们煮着吃。我的母亲只好咳声叹气地给他们煮着吃，暗地里眼泪不止地流。“老总”们吃剩的鸡骨头肉，母亲让我吃，我看着鸡肉就好象看到了眼泪汪汪的母亲，我吃了一口要呕吐，吃不下去，好象里面有她老人家的辛酸泪和仇恨的血。我从幼年起就产生了要反对军阀“老总”们，为母亲报仇的心愿。

启

蒙

一九二八年三月我和付景廉、金景都考入伊通县立中学，在这里结识了王正绪等同学。我不算聪明，记性也不太好，为了取得好的学习成绩，只有多下苦功，努力学习。功夫不负有心人，从小学到中学，每次考试成绩都是前十名，有一次考了第三名。王正绪很聪明，也很用功，他总考第一名。当时我擅长的是美术、物理、化学、数学，对于文言文和历史不感兴趣。

在这个学校念了两年书，能够留下记忆的有这么几件事：我们学校来了一位北京大学毕业生当国文教员。他的姓名记不清了，但他在上每堂课时总是先有一篇讲演，这是很新鲜的事情。他公开反对旧礼教，提倡新文学。对张作霖的军阀统治异常愤恨不满，揭穿军阀投靠帝国主义卖国的罪行，对李大钊被军阀杀害表示不平和惋惜。还启发学生对新文学发生兴趣，介绍我们如何用通信的方式向长春买书，使同学们的思想开始活跃起来，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民族兴亡。

一九二九年夏，帝国主义唆使国民党奉系军阀向满洲里苏联边界进犯，大肆进行反动宣传，说：“赤化”是“共产共妻”等谣言。我们家乡有个叫王老大的，他在军阀军队里当兵，参加了满洲里作战，被苏联红军俘虏了，经过优待教育以后，放回来了，他向我们讲了我们从来

没听说过的故事：苏联是劳动者的国家，劳动阶级互相友爱，还有国际主义精神，全世界劳动阶级都是一家人等等。

我们的县城是一个比较闭塞偏僻的古县城，刚成立的县立中学设备短缺，教员讲课没有仪器作实验，学生就更难在理化实验室自己进行操作实验了。尤其是政治闭塞，这对于我们思想已经活跃起来的血气方刚的青年已经太不能满足了。正好，付景廉的哥哥到长春教书，他家也搬到了长春，他在长春自强中学读书。后来他来信让我和金景两人一齐去长春学习，那里的学习条件好，比较进步。一九三〇年三月我们两个都考入了长春市私立自强中学校三年级，在中四班读书。

在这所学校里，我遇到了启蒙我走向革命的第一个人，这就是国文教师李少一，他戴一付眼镜，脸上有麻子，讲起课来明确而生动，打动了多少同学的心！他在国文课内增加了“泛读课”，在泛读课让我们阅读鲁迅的《呐喊》、《彷徨》、《野草》、《故乡》、《阿Q正传》、《华盖集》等，还有胡愈之翻译的短篇小说《星火》等等。不仅阅读，还要写心得笔记，写文章大意，写体会，把同学中写得比较好的作为范例。还针对现实，联系这些文章提出许多问题启发同学们独立思考，展开讨论。不仅新文学思潮占了上风，而且激发了同学们奋发图强和向上的进取心。

在这时期，我结识了郭峰^(郭连郊)、纪坚博^(纪右文)、李兆祥、关继武、刘志贤（陆平）等同学，他们经常在《自强半月》刊上发表文章。当时我对理科感兴趣，只发表过一次文章，内容也不记得了，但是我特别喜欢这个老师和学生们共同办起的刊物，每期都和同学们抢着看。

《自强半月》是李少一老师利用泛读课，在学生中组织读书会，每半个月发一期刊。主编和审查是李少一老师，纪右文（纪坚博）是编辑刘志贤、郭连郊（郭峰）经常发表文章。主要是诗歌、短文、小品、泛读笔记等，各班学生都可以投稿，以学生自办为主，李少一老师指导。

刘志贤的诗，郭连郊、纪右文的小品文都是最受同学们欢迎的。这个刊物不仅活跃了同学们的思想，而且锻炼了一批人材。

在李少一老师教诲和启蒙下，在《自强半月》的推动下，我们许多同学后来都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比如：李树新（胡乃超）早年在华北某部队当参谋长，后来牺牲了；关继武在辽宁省委当农村部长，现在病故了；郭峰在北平参加革命，现在是辽宁省委第一书记；纪坚博在英文周报当负责干部，现在退休了；原来北京大学校长陆平也是我们同班同学，他原名叫刘志贤，又叫刘哲，他在吉林一师就入党了。后来金景叛变出卖了许多革命者，陆平躲避起来，经李少一老师借给他路费到北平找到了组织关系，继续参加革命斗争，现在在七机部工作，他的弟弟刘居英跟他很早就参加了革命，曾任哈军工校长，现在听说任八机部副部长。李兆祥（李广安）现在在三机部；还有杨振华等同学参加了革命。这些老同学能够走上革命道路，并为革命做出许多贡献，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和李少一老师的辛勤培育和革命启蒙是分不开的。

在自强中学读书这段生活是使我难忘的，可是我开始走上革命道路还是在吉林一中。

觅 路

一九三一年春，我考入吉林省立第一中学高中部理科第五班。同年夏，我又考上了吉林大学预科，但由于“九一八”事变，日本鬼子铁蹄践踏了我可爱的家乡，沈阳、长春、吉林三个城市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下，只在三天内都被沦陷。吉林大学停办了，我只好仍在吉林一中读书。

从伊通到吉林要路过长春，在长春我住在小学同学付景廉家里，他

在吉林一中又是我同班同学，所以互相十分亲密。

“九一八”事变后，于九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提出组织群众的反帝运动，组织东北游击战争的号召。二十四日，上海十万学生举行抗日罢课，三万五千码头工人举行抗日罢工。东北出现许多抗日义勇军和日寇展开殊死的战斗。在全国掀起了抗日运动高潮。怎样才能解救祖国的危难？这是摆在每个中国人面前的大问题。

在我们学校也和各地的学生一样，心中燃烧着复仇的烈火，学校里进行着半公开的抗日活动。那时，在我们学校里已经有了共产党的党团组织，他们成了秘密领导抗日斗争的核心。同学们的政治热情十分高涨，政治经济学、唯物辩证法及其他禁读书也在普遍地互相传阅和讨论着，学校的宿舍，教室成了我们讨论研究的场所，每当上日语课和考经课这些奴化教育课的时间，我和同学们到外面去或在操场上打球，采取巧妙的罢课斗争。

就在这时，经过付景廉的介绍，我结识了中共吉林市委负责人李世超。他是一个三十多岁高个子的男子汉，戴着一付近视镜，说话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使人一接触就肃然起敬。那时党团还没有公开，他在吉林女师当孝经教员，公开合法身份为掩护，开展党的秘密工作，后来他曾任中共满洲省委秘书长，在巡视丹东时被叛徒认出告密被捕，一九三六年牺牲。

李世超老师的家离我们吉林一中不远，在新开门里兰旗堆子，在江沿附近。第一次到他家是一九三二年春，付景廉和我一起应邀到了李老师家中。他的爱人叫石正芳，有两个男孩子，还有李老师的妹妹。从此以后，每到星期六或星期天，我和付景廉还有金景同学都去李老师家。

来来往往还有许多同学，我们请他解答政治经济学、唯物论辩证法等难题，还讨论抗日的前途，祖国的命运。有时也分析学生中的各种思想动态。李世超经常向我们宣传国民党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是叛变革命，中国人民要抗日，把日本帝国主义从东北赶出去还得是朱总司令和毛委员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他又介绍许多东北抗日义勇军和关内中国工农红军的消息，讲述一些革命道理，总是循循善诱，激动人心。他还讲了将来依靠共产党，依靠工农红军救国的光明前途，走苏联十月革命的道路将来建设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自由幸福的新社会，祖国强大，再也不受烈强的欺辱。使我们青年增长了革命知识，增强了革命信心，青年之路只有革命。它象一团烈火在我胸中燃烧，我一定要找到共产党，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干革命。

可是，到那儿找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呢？慢慢地，我觉得李世超老师就是一个共产党，不然他怎么知道那么多革命道理和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事呢？有一次我实在按捺不住心头的热望，我想要他介绍我入党又不好意思正面提出来，我说：“我受伪满学校奴化教育非常苦闷，感到没有出路，你能给我指出一条革命的出路来吗？”他问：“你能当‘马胡子’吗？”我很奇怪为什么叫我当“马胡子”呢？他解释说：“敌人称作‘马胡子’，实际就是人民的抗日游击队和义勇军。”我又问他如何去呢？谁介绍去呢？他没有回答。当时，我的思想还未准备好，只是想必要的时候我能去到疆场上和敌人作战，这是一条革命的出路。由于他没具体答复，我也没有继续问，这是一九三二年夏天的事。

这年冬天放寒假，我住在哈尔滨叔父家里，有一次同学全景来找我他秘密地对我说：这次他是负有主要使命来的，他说他是共产主义青年团员，他是来开会、受训和取秘密文件来的。我听到这话非常高兴，并

对他表示敬仰，我马上求他介绍我参加党团组织，他见我诚恳而心切，就说：我一定向组织介绍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这时他提出来他回吉林路费不够，请我帮助，我当时捐助了五元哈大洋，我为能帮助他从事革命活动而感到高兴。金景见我如此热情，他毫不犹豫地把我领到旅馆，见到和他一起来的共产党员冯玉升同学。

两、三年来的愿望，找寻革命出路——参加革命组织，总算找到线索了。

一九三三年春天，开学以前我找金景问他介绍我入团还要办那些手续？他传达了组织上的意见：“组织上认为你的家庭成份不好，并且了解你叔父是个伪官吏，你个人是个革命的积极分子，还要经过一个时期的考验，好好学习革命理论，将来可以入团。”当时，我觉得组织对我是信任的，意见是中恳的，所以我没有泄气，而是更虚心地学习革命理论，参加一切能够参加的革命活动，接受组织对我的考验。

有一次，金景告诉我关于反日游击队和义勇军活动的消息，并秘密通知党团员和反日积极分子给盘石赤色游击队募捐，每人可以自愿捐款。我马上借了三、五元钱交给了金景，并且再一次请求组织审查我，我要走革命的路，要入团。

考 验

一九三三年五月七日拂晓，日本宪兵队把我和于克两人逮捕。原因是五月六日夜间金景和郭连郊（郭峰）在松花江沿边传单时被伪警察逮捕押送到吉林日本宪兵队，日本宪兵队到我校检查，因为我的睡铺挨着金景的铺，于克挨着郭连郊，敌人要想从我们俩的口供中来了解金景和郭连郊的日常活动。

这天拂晓，正当大家正在熟睡的时候，突然从外面闯进两个鼻子下面留有黑疙瘩胡的日本宪兵和十几个伪警察，他们全副武装，荷枪实弹，如临大敌，把全宿舍的人喊起挨个搜查，对我和于克搜查的更细，把柳条包都打开翻个底朝上，把我们放在桌子上的比较进步的书也拿走了，有日本进步学者河上肇著的《政治经济学》，还有《唯物论与辩证法》、《现代世界观》等。

当日本宪兵队那两个人把我和于克押往宪兵队驻地时，在新开门外的路上，还看见了贴在电线杆上的绿色传单，日本人不让我俩望，催促我们低头快走。到了日本宪兵队的大院内，只见一排五间瓦房，让我们俩在西外屋南窗下，面向西墙靠在一桌子旁站立着。当日本宪兵们反复地问我们俩关于金景和郭连郊的事时，我俩都回答：“不知道。”这时他们让我俩面壁而立不许互相说话。一会儿我们看到把金景五花大绑地押进里屋过堂，隔着一道门窗我们可以听到里屋审讯的情况，我们就细心地听着，日本人用中国话问“传单是从哪里来的？”起初金景不肯说，后来日本人威逼说：“你不说是不行的，不说就给你上刑，上刑后你也得说。”见金景仍不开口就用手打了金景两个大耳光，就在这时没有骨气的金景忙说：“别打，别打，我说，我说。”当我听到这时，脑袋嗡的一下子，金景叛变了！我和于克清楚地听到金景把全部组织秘密都暴露了，回答了敌人提出的全部问题：“谁是共产党员？谁是共产主义青年团员？谁是积极分子？住在何处等等”。我奇怪他没有招出我为反日积极分子，可能他被推进来时见到我已在外屋，又知道我叔父给日本人做事才没敢说呢？当时也不顾这些，特别是听金景招出李世超老师和他的住处时我万分焦急。

原先听到金景叛变后，我和于克就在面前桌面上的灰尘上用手写字，互相鼓励：坚决不说，不当叛徒，就是上刑也说不知道。听到李世超老师的安危受到威胁，我更着急，想什么办法脱身报信呢？我突然想起利用我叔父的

的数学教员杨介人对他讲：“日本人不允许我离开学校，还说随传随到，你赶快给李世超老师送个信，金景已经咬他了，让他快躲一躲。”杨老师说：“老李走了”。这时我才放下心来。听他们告诉我，今天在学校里逮捕了好几个人，有的正在操场打球也抓去了，于章、常家春、吕文等同学都被捕了。后来我才知道，李维民听一中学生朱世超向他汇报了金景、郭连郊夜间被捕，日本宪兵到学校抓人的事，李维民马上通知李世超等及时转移了。

过了两天给家和叔父写信，述说我因为与金景同寝相连因此被捕的一天经过。经学校训育主任赵力哲审查以后发出。又过了二十来天，日本宪兵队没来找我的麻烦，我本来应该放下心来。可是我的心情怎么也平静不下来。想起不久前在学校、在李世超老师家，多少热血方刚的青年，大家寻求革命真理，慷慨激昂地议论着祖国的前途，抗日斗争的发展，这是多么令人留恋的场景啊，它好象就在昨天！现在却是死气沉沉，有的好同学被抓走了，有的为了革命少受损失隐蔽和转移了，李世超老师跑到哈尔滨也不知道怎么样了，真叫人挂念。我借故向学校请假，说我要去哈尔滨我叔父家，学校准假后我即动身了。

五月下旬我来到了哈尔滨，我想尽办法要找到李世超等从吉林跑出来的同志，我要向他们表示我要革命的决心。可是，由于那时我还没有组织关系，在这个几十万人口的大城市里要找到他们可真象在大海里捞针一样难哪！假期已满还没找到，我只得回到学校继续读书。

入 共 青 团

一九三三年七月放暑假，我又来到了哈尔滨，这次很庆幸，在道里中央大街头道街口，离江沿不远的商务街上找到了李世超同志。当时他